

ECONOMICS STUDY
OF SHANGHAI SCHOOL

第6辑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周肇光 关注「警戒线」，证伪「洋教条」

——访经济学家王振中

程恩富 陈士辉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态势

刘军梅 李新 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俄罗斯格拉季耶夫经济思想

〔美〕大卫·科兹 新自由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

郭志琦 徐则荣 李红兵 论两种市场观的分歧和对立

石翼平 关于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三个疑问

张树德 俞自由 私有制的效率分析

陈其人 关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几个问题

〔印度〕艾吉特·辛哈 标准商品理论能否解决价值转形问题

朱妙宽 新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刍议

〔英〕约·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

张圣兵 产业的人文化：新型工业化的当代趋向

夏立军 代理理论、所有制与公司治理效率：一个分析框架

——兼与张维迎教授商榷

邵丽华 对劳动价值论「三个暗含前提」的质疑

——兼与晏智杰教授商榷

张银杰 评张五常教授的「私有产权制度最优论」

——兼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

蒋学模的经济思想和学术贡献

走革命与综合之路

——兼评蒋自强等著《经济思想通史》

袁恩桢 《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探索——李家镐论文选》序一

程恩富 《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探索——李家镐论文选》序二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经济学. 第6辑/程恩富, 顾海良主编.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6

ISBN 7-81098-152-8/F · 136

I. 海… II. ①程… ②顾… III. 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理论-文集
IV. F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4018 号

- ☐ 特约编辑 徐永禄
- ☐ 责任编辑 麻俊生
-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HAIPAI JINGJIXUE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装订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3 印张 253 千字

印数 0 001—1 800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专 访

- 关注“警戒线”，证伪“洋教条”——访经济学家王振中……………周肇光(1)

论 文

-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态势……………程恩富 陈士辉(11)
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俄罗斯格拉季耶夫经济思想……………刘军梅 李 新(31)
新自由主义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美]大卫·科兹(51)
论两种市场观的分歧和对立……………郭志琦 徐则荣 李红兵(66)
关于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三个疑问……………石冀平(75)
私有制的效率分析……………张树德 俞自由(84)
关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几个问题……………陈其人(91)
标准商品理论能否解决价值转形问题……………[印度]艾吉特·辛哈(99)
新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刍议……………朱妙宽(110)
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英]约·斯·穆勒(130)
产业的人文化:新型工业化的当代趋向……………张圣兵(149)

争 鸣

- 代理理论、所有制与公司治理效率:一个分析框架
——兼与张维迎教授商榷……………夏立军(159)
对劳动价值论“三个暗含前提”的质疑
——兼与晏智杰教授商榷……………邵丽华(170)
评张五常教授的“私有产权制度最优论”
——兼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张银杰(177)

人 物

- 蒋学模的经济思想和学术贡献……………张守谦(185)

书评与书序

走革命与综合之路

- 兼评蒋自强等著《经济思想通史》……………徐永祿(195)
《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探索——李家镐论文选》序一……………袁恩桢(199)
《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探索——李家镐论文选》序二……………程恩富(201)

CONTENTS

Interview

- Pay Attention to "Warning Limit" and Refute "Foreign Doctrine"
—An Interview with Economist Wang Zhen-zhong Zhou Zhao-guang(1)

Paper

- The Research Situations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Japan
..... Cheng En-fu Chen Shi-hui(11)
- Social Justice and Economic Increase:
Economic Propositions of Russian Economist S. Glazev Liu Jun-mei Li Xin(31)
- Neo-liberalism and the U. S. Economic Expansion of the '90s David Kotz(51)
- On the Divergences and Antithesis of Two Kinds of Market View
..... Guo Zhi-qiang Xu Ze-rong Li Hong-bing(66)
- Three Qu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Theory of Socialistic Market Economy
..... Shi Ji-ping(75)
- The Analysis of the Efficiency Of Private Ownership Zhang Shu-de Yu Zi-you(84)
- On Distributing 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Chen Qi-ren(91)
-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s the Standard Commodity a Solution? Ajit Sinha(99)
- My Opinion on the Value Theory of Neo-political Economics Zhu Miao-kuan(110)
-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Philosophic Method of its Research J. S. Mill(130)
- Humanization of Industry: Contemporary Tendency for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 Zhang Sheng-bing(149)

Debate

- A Framework on Agency Theory, Ownership Styl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fficiency
—Concurrently a Deliberation with Prof. Zhang Wei-ying Xia Li-jun(159)
- Doubt on "Three Implied Prerequisites" of Labor Value Theory
—Discuss with Professor Yan Zhi-jie Tai Li-hua(170)
- A Review of Zhang Wu-chang's Theory "Optimum Private Ownership System"
—A Discussion about Integra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 Zhang Yin-jie(177)

People

- An Introduction to Jiang Xue-mo's Economic Thoughts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 Zhang Shou-qian(185)

Book Review and Preface

- A Way of Revolution and Integration
—Comment on *A General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by Jiang Zi-qiang etc. Xu Yong-lu(195)
- Preface I to *A Probe into the Socialist Reform and Development*—*An Florilegium of Li Jia-huo*
..... Yuan En-zhen(199)
- Preface II to *A Probe into the Socialist Reform and Development*—*An Florilegium of Li Jia-huo*
..... Cheng En-fu(201)

关注“警戒线”，证伪“洋教条”

——访经济学家王振中

周肇光

内容提要 国内外的各种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持续扩大。对此，王振中教授在被采访中强调了三点：第一，对于基尼系数中存在的“警戒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第二，库兹涅茨 50 年前所得出的“倒 U 曲线假说”经不起历史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数据表明，美国仍然没有消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第三，日本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方面，政府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味地偏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维来回顾或总结历史，否认政府的作用，那么就会扭曲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

关键词 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 “倒 U 曲线假说”

周：作为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杰出代表之一，您身兼中华外国经济学会研究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经济期刊联合会会长，中华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理事，国光基金秘书长等职，又发表过《经济特区与加工区的比较研究》、《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学术价值及其发展依据》等不少很有影响的论著，目前您又在关注中外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王教授是否可以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王：可以。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如何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的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对世界(WORLD)范围或国际(INTERNATIONAL)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方面有三个代表性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世界银行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例如，世界银行的《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其主题就是《与贫困作斗争》。在这份报告中，它特别谈到了过去 40 年中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该报告指出，1960 年时最富裕的 20 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贫穷的 20 个国家的 18 倍，到 1995 年这一差距扩大到 37 倍。这说明，在过去的 40 年中，国与国

收稿日期：2004-2-20

作者简介：周肇光(1952—)，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主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急剧增加,其必然导致出现世界范围内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在这种背景下,为争夺财富而引起的动乱或战争就不可避免,而这些动乱或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最终却相当多地落在了世界的穷人身上。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曾经研究了1990~1995年期间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冲突和内战的发生率,结果发现冲突和内战过于集中在贫困国家。还有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博士2002年写了一本书叫《20年内解决20个全球问题》,对到2020年时的全球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更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 Francois Bourguignon 和 Christian Morrisson 在2002年《美国经济评论》所刊登的一篇论文。该文章研究了1820~1992年期间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两位作者通过对170多个国家有关资料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世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基尼系数提高了31.4%,泰尔指数(Theil index)提高了63.8%,这表明世界收入不平等在剧烈地恶化。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系列报告。如果说,前面所述的研究对象属于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那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系列报告的研究对象就属于国际范围的收入不平等。拉美经委会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拉美国家近15~20年期间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实施改革开放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其中的教训之一是“以收入分配为核心的社会不公在恶化”。令我们深思的是,该报告的作者曾在书中自信地说到:“我们得出的任何结论也适用于拉美以外的地区。”

周: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其所反映的贫富差距程度,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研究上述问题时,许多人仍然偏好运用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虽然已经存在90多年了,但我认为,把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至今仍然是一个极为简明有效的工具。根据该指标,基尼系数可在0和1的区间内取值,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越大,则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联合国有关组织曾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等;0.2~0.3表示比较平等;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等,大于0.6为高度不平等,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应该说,将基尼系数0.4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并非多余,它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也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的一种客观总结,因而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0.4这一“警戒线”的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周: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要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其所反映的贫富差距,它的现实意义何在?

王: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高还是低,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过大,这就反映了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这种经济增长中的不公正现象,如果任其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2001年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就曾经告诫人们: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已是连续4年在上升,虽然与我们建议的0.45实际控制线还有一段距离,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及其发展势头确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同时,国家统计局对于非常贫困的底层百姓的困境还进行了分析,提出对一些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很欠缺的底层百姓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在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出现请愿、示威、静坐、卧轨、自杀、冲击地方党政机关等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从客观上讲,国家统计局告诫并不是危言耸听,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更为严重的局面。例如,有的学者曾计算了1988~1999年期间我国居民正常收入(即不考虑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以及其他非法等非正常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从1992年起就已经连续突破0.4的警戒线。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仍然是严峻的。尤其是在2001年的“两会”期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成为了“热点”问题。在“十五”规划纲要里,有关“增加居民收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都出现在显著位置上。但是,当时在公众的内心,对于未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担心并没有得到缓解。以至于2003年年末,国家发改委的一位负责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和关注。原因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我国却为3.3:1或3.5:1。应该说,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告诫,还是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2003年社会上发生的一系列不稳定的现象,正是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目前许多学者都喜欢拿中国与印度相比。印度有关人士也说21世纪是印度世纪。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21世纪究竟属于谁,目前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如果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与印度相比,那么,无疑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为0.403,印度1997年为0.378;在最穷的10%的人口收入与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国是12.7倍,印度是9.5倍;在最穷的20%的人口收入与最富的20%的人口收入之比方面,中国是8倍,印度是5.7倍。这些数据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同印度相比,虽然我们的GDP增长速度是高的,但是,在收入分配平等方面我们却是逊色的。因此,这种经济增长高速下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平等的增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不是按收入而是按消费来衡量的话,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比如,据家庭调查显示,在1990~1998年

期间的人均消费方面,我国人口中10%的最贫穷人的年均消费仅增长2.5%,而10%的最富有人的年均消费却增长11%。

在比较中国与印度的收入分配格局时,我们回顾一下库兹涅茨在60年前做过的对印度与美国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那时他发现,在收入分配方面,1949~1950年的印度,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是28%,而美国为34%;相应地在最高的1/5份额中,印度是55%,而美国为44%。由此,库兹涅茨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我想,库兹涅茨得出该结论的根据是: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1的话,那么,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所占份额之比,印度为1:1.96,美国为1:1.29。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印度的1.96倍大于美国的1.29倍。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是有道理的。

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库兹涅茨60年前曾得出的结论现在还有效吗?我们还能够对此结论给予教条式的理解吗?显然不能。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印度(1997),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分别是34.7%,而美国(1997)为31.3%;相应地在最高的1/5份额中,印度是46.1%,而美国为46.4%。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1的话,那么,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份额之比,印度为1:1.33,美国为1:1.48。也就是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印度的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平等,因为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印度的1.33倍小于美国的1.48倍。这一事实的展现,可以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思考。

周: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王:按照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如果基尼系数从大到小排列的话,在世界银行所能获得数据的107个国家中,我国位于第43位,属于进入“警戒线”国家的行列。在收入分配份额方面,如果最低的10%人口所占比重也从大到小排列的话,我国位于第67位;如果最高的10%人口所占的比重也从大到小排列的话,我国位于第47位。1998年,我国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31.2%,最高的1/5所占的份额为46.6%。如果以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为1的话,那么,更低的3/5所占的份额与最高的1/5份额之比为1:1.49。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我国无论是与上述印度的1.33倍相比,还是与美国的1.48倍相比,我国都是最突出的。

美国学者布朗早在20年前就警告过人们:收入分配格局严重不对称的国家,常常缺乏社会的内聚力,要动员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相当困难;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普遍存在严重不公平的现象,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很大。对于这些20年前的忠言,我们应该引起警惕。综合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的印象: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财富占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持续扩大,我国在世界上已经从一个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周:在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几乎存在着一种言必谈库兹涅茨倒 U 曲线的现象,对于该理论,您有何评价?

王:在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一种言必谈库兹涅茨倒 U 曲线的现象,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洋教条”。坦率地讲,我对库兹涅茨提出的倒 U 曲线假说,从来就不相信它科学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我们知道,所谓库兹涅茨提出的倒 U 曲线假说,来源于他在 1955 年所写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篇文章,虽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这篇论文大概是 5% 的经验资料和 95% 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但它还是被人们视为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中的一篇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代表作。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学界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的重点是收入的功能分配,但自 1955 年起,经济学界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的重点基本上开始转向了收入的规模分配,至今对于后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在当前浮躁的环境中,由于有人盲目地教条式地推崇该理论而出现了扭曲现象,因而非常有必要深入探讨库兹涅茨提出倒 U 曲线的假说。

例如,库兹涅茨指出,美国两个最低 1/5 收入组的份额从 1929 年的 13.5% 上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8% (即 1944 年、1946 年、1947 年和 1950 年的平均数),而最高 1/5 收入组的份额从 55% 下降到 44%。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的判断:(1) 不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缩小是最近发生的,可能并不代表它们早期增长阶段的特点。同样,前面提出的各种因素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而不是早期收入不平等的稳定和缩小。(2) 因此,可以假定不平等的长期波动构成长期收入分配的特性: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考虑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性,如果接受部门 B (即非农部门) 分配不平等更大这个假定,那么,低收入份额应该显示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早期的经验证据表明,在最近 50~70 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没有进一步扩大。相反,近 20~40 年内还有所缩小。对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此缩小是与实际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

他的这个结论经得起历史验证吗? 现在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过去了将近 60 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美国的不平等是否继续缩小了?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世界银行 1987 年的资料计算,美国家庭 1980 年时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下:收入最低的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5.3%,第 2 个 20% 的家庭占整

个收入的 11.9%，第 3 个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17.9%，第 4 个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25.0%，第 5 个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39.9%。又根据世界银行 2001 年的资料计算，美国家庭 1997 年时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下：收入最低的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5.2%，第 2 个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10.5%，第 3 个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15.6%，第 4 个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22.4%，第 5 个 20% 的家庭占整个收入的 46.4%。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库兹涅茨用美国 1929 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 1944 年、1946 年、1947 年和 1950 年的平均数）的情况为依据提出“倒 U 曲线假说”似乎说得过去，但用半个多世纪后的数据来分析，则这个假说就很难成立。

例如，用 1997 年与 1980 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997 年与 1980 年相比，美国两个最低 1/5 收入组的份额从 1980 年的 17.2% 下降到 15.7%，而最高 1/5 收入组的份额从 39.9% 上升到 46.4%。前后两者之比由 1980 年的 1:2.32 变成了 1997 年的 1:2.96，表明贫富差距又扩大了 27.6%。

再如，用 1997 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个最低 1/5 收入组的份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8% 下降到 1980 年的 15.7%，而最高 1/5 收入组的份额从 44% 上升到 46.4%。前后两者之比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2.44 变成了 1997 年的 1:2.96，表明贫富差距又扩大了 21.3%。

总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1997 年期间，两个最低 1/5 收入组的份额持续下降，而最高 1/5 收入组的份额反而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果不拿两个最低的 1/5 收入组与最高的 1/5 收入组比较，而是拿最低的 1/5 收入组与最高的 1/5 收入组这两个极端组比较，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如在 1980 年时，美国最低的 1/5 收入组与最高的 1/5 收入组之比为 1:7.53，1997 年为 1:8.92，表明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又扩大了 18.5%。

即使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也无法否认上述事实，因为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 10 版和第 12 版的数据计算，美国最低 1/5 收入组的份额与最高 1/5 收入组的份额之比，1973 年为 1:6.83，1997 年则变为了 1:8.92，也就是说，在 26 年期间，贫富两极之间的差距扩大了 31%。如果用更低 3/5 收入组的份额与最高 1/5 收入组的份额相比，则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就更加显著。1973 年，美国更低的 3/5 所占的份额为 35%，最高的 1/5 所占份额为 41%，前后两者之比为 1:1.7。1982 年，美国更低的 3/5 所占的份额为 33%，最高的 1/5 所占份额为 42.7%，前后两者之比为 1:2.9。也就是说，在 10 年期间，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了 71%。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缩小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们的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尽管美国经济得到了增长，但并没有根本消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

周：由此可见，对于阐述库兹涅茨的“倒 U 曲线假说”时不能充满随意性，

不然就会出现扭曲现象?

王:是的。我早就注意到有人在阐述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时充满了随意性。如有人这样解释:根据库兹涅茨的估计,倒U曲线从上升到下降,也就是走过“倒U曲线”的“拐点”(“倒U曲线”的最高点为“拐点”),必须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非农人口所占的比重必须达到60%~7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走过这个“拐点”,英国大约经历了100年时间,美国和德国大约经历了60~70年。

这里起码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美国到底用了多长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库兹涅茨在分析美国时用的是1929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1944年、1946年、1947年和1950年的平均数)的数据,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29年为847美元,1942年达到1171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的时间,如果从1776年算起,用了大约166年;如果从1900年算起,用了41年;如果从1929年算起,只用了13年。哪里有什么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经历了60~70年?

我国理论界有人教条式的诠释“倒U曲线假说”时充满了随意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无视库兹涅茨在研究方法方面所曾经做出的一系列警告。

例如,当前人们在研究收入的规模分配时偏好使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但库兹涅茨告诫大家,在解释分配变化的原因时,有5个规定要遵守,其中之一是“分配应该是完全的,即涵盖一国所有单位而不只包括一小部分高收入者或低收入者”。因此,那种仅仅靠几百个、几千个或几万个样板调查就做出结论的研究,恐怕是值得斟酌的。

又如,库兹涅茨在研究收入份额及分配不平等的长期变化时,要求研究的时间长度方面为“一代人或大约25年”,不然“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划分就会失去其意义。而在国内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收入规模分配的实证研究所需数据的时间跨度仅仅不到10年。这样的研究结果必然会出现库兹涅茨式的担心,即“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划分是否失去了意义?

还如,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方面,库兹涅茨曾在一段话里连续对4种观点提出了“危险”警告。

第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发达国家过去的收入不平等促成了储蓄的积累以及为基本资本形成(basic capital formation)提供了资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的结果,保持和加强欠发达国家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是实际必要的。对于这种观点,库兹涅茨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类比。

第二种观点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缺乏隐含在累进税中的惩罚等,对当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在过去被证明是起促进作用的。对于此种观点,库兹涅茨又批评道:这个观点是很危险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因为过去在较小的欧洲国家或者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后裔,国外投资为推动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本资源,所以欠发达国家能确信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今天也可以期待类似的结果。对此,库兹涅茨告诫人们:这个观点是危险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采取对立的立场和宣称目前的问题完全是新的,我们必须设计一套完全不受以往知识约束而想象出来的解决办法。对于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狂热做法,库兹涅茨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同样危险的。所以,库兹涅茨 48 年前就诚恳地提出了如下的见解:要在这个领域中做出成效必须要求市场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转变。

这些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周:在我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地区收入差距问题一直为很多学者所偏好。在这方面,国外的经验教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方面关注。我注意到,近来一位学者发表了“日本地区收入差距的倒 U 字”的研究成果,他做出了如下的结论:日本政府的政策在地区收入平均化过程中作用非常小,大致说来,只有 5%~10%。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王:我对此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先后持续了约 10 年的时间。上述那位研究员的论文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我仔细看过上述文章之后,深深感到,在日本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依然很多。例如,该研究员指出,在 1961 年,日本正处于高速成长的时期,逐渐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即在 1961 年之后地区收入差距开始趋于缩小,出现了一个倒 U 字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流动;并且,认为日本在 1961 年之前,无论是人还是资本,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但 1961 年之后,可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了,因而日本企业开始流向落后地区。最后,该研究员做出了如下的结论:日本政府的政策在地区收入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小,大致说来,只有 5%~10%。我感到,仅仅上述这些内容就涉及到了 3 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流动人口问题,即是否在 1961 年之后日本的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了?根据日本 1977 年的统计资料,日本人在城市之间、行政区之间或村镇之间的迁移人口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 1954 年至 1961 年期间的最低值为 5.43%(1956 年),最高值为 6.42%(1961 年);而在 1962 年至 1977 年期间的最低值为 6.52%(1977 年),最高值为 8.02%(1970 年)。该数据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 1961 年之后,日本的人口并没有停止流动;二是在 1961 年之后日本人口流动的比重反而提高了。因此,断言“1961 年之后,可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了”就显得似乎有点武断。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的人口流向问题,即是否在 1961 年之后日本的流动人口已经流到了经济不发达地区?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仅 1961 年以后,流动人口仍然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即使在 1973 年变成

了发达国家以后也是如此。根据日本的统计资料,在1960~1965年三大都市圈的净迁移(即迁入者超出迁出者)为311.5万人,1965~1970年净迁移为202.1万人。东京都会地区表现更为突出,1960~1964年净迁移185.4万人,1965~1969年净迁移145.2万人;尽管1970年东京等地发生了轰动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等公害问题,但人口仍然流入东京都会地区,1970~1974年净迁移87.6万人,1975~1979年净迁移16.9万人。结果正如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所表明的,日本三大都市圈即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人口过密化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没有得到控制,在1960年占全国人口比重为37.4%,1965年为41.1%,1970年为43.9%,1975年则为44.9%。对于这个问题,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在1987年公布了第三次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在展望20世纪90年代的地区劳动力流向问题前景时曾指出,劳动力仍将进一步向大城市流动;并推算2000年时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50.4%。其原因之一是青年阶层向往大都市。

第三个问题是日本政府的作用问题,即日本政府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是否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讲,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讲,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也就是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流动的过程。所以,仅仅研究地区差距与经济结构转型或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这只是一种表层的实证,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在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经济结构转型或与人口的流动。这就必然涉及到政府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在缩小地区差距问题上,日本政府的作用体现得十分明显和重要。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政府通过不间断地制定经济发展计划,防止城市过度集中,分散工业布局,以求得地区之间发展的平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1962年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曾明确:对那些在经济增长中落后了的部门,必须按照缓和社会紧张的观点,给予特别的考虑。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所谓就业的改善,不仅仅是增加劳动力的就业,而是还要积极地消除低所得者阶层。该计划并且严肃指出:决不能胡乱追求工业的分散,即使是分散,也还是要有一定的计划性。日本政府1962年在《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则进一步强调:该计划以“防止城市的过度集中”和“消除地区差别”为口号,提出了利用大规模建立新据点的方式来发展工业的设想。对此,正如大来佐武郎所说:政府的计划使企业家有了信心,以及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均衡的发展。因此,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起由集中到分散的转折,都是在政府的计划指导下发生的,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自发行为的结果。

另一个方面是政府运用特殊的财政投融资机制,做大“蛋糕”,为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提供物质保证。根据大内兵卫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日本高速

发展的核心是设备投资的激增,而国家在导致高速发展的设备投资中起主导作用。日本国家政策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般会计支出项目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更为迅速;二是财政投融资的增加较一般会计支出更为迅猛。在财政投融资特别是会计方面,十年期间增长了5倍。与此相适应的是,同期内的银行对设备投资贷款余额也增至5倍。这决不是巧合,而是日本国家政策的结果。因为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基本运用在三个领域:一是向民间提供低利率贷款;二是向政府经营的企业投融资;三是承兑地方债,对地方公共事业提供融资保障。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产业投资和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1984年一位美国学者在日本实地考察了一年之后写了《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形成和实行国家战略方面,日本有着极为出色的系统机制。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之,日本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可无论如何,那种否认或贬低政府作用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这是有其现实根源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偏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维来回顾或总结历史,那是需要十分小心的,不然就会扭曲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因为世界各国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没有市场。例如,哈耶克由于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后曾变得“声名狼藉”,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放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

Pay Attention to “Warning Limit” and Refute “Foreign Doctrine”

—— An Interview with Economist Wang Zhen-zhong

Zhou Zhao-guang

Abstract Data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suggest that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in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is continually getting larger in the recent years. In view of this, Professor Wang Zhen-zhong made three points in the interview. Firstly, the warning limit set for the Gini Coefficient can't be treated lightly. Secondly, the Inverted-U Hypothesis advanced by Kuznets 50 years ago can't pass the historical test, since data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late 1990s indicate that the issue of polarization 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get poorer is still in existence in the US. Thirdly,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narrowing the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y, we can't have blind partiality for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neo-liberalism in reviewing or summarizing the past and deny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otherwise the real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ll be distorted.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Gini Coefficient Inverted-U Hypothesis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态势

程恩富 陈士辉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以 2003 年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第 51 届大会的论文为依据,先描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若干特点与态势,然后综述关于社会经济学和规范理论,全球化和元理论,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存在下去,是资本主义控制市场还是市场控制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阻碍,以及银行衰退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金融行政等具体问题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 日本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全球化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现代政治经济学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特点与态势

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起源于 19 世纪末,并在 20 世纪上半期对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 90 年代以来面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瓦解的新形势,日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探讨又掀起了新热潮。2003 年 10 月 18~19 日,笔者之一——程恩富应邀出席在日本经济理论学会(日本惟一的拥有 800 多名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会),程恩富在大会上作了《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与改革三大流派》的专题学术报告)第 51 届大会期间,就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浓厚的学术气息。其研究特点和态势表现为:

首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在日本,一方面继续研究和刊行《资本论》创作史、经典文献阐释和马克思经济学入门的论著;另一方面,国立东京大学和横滨大学、私立武藏大学等众多高校仍继续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课程(称为经济学 I,或经济原论,或社会经济学,而把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 II,或近代经济学),以及用马克思经济学来分析的世界经济课程(称为现代经济体

收稿日期:2004-2-1

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士辉(1971—),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系课程等),并作为经济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修课。日本的经济理论学会不仅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传播和学术传承方面搞得出色,而且更富有理论创新精神。会长大谷禎之介等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但今日多元的诸多现象,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因而新构建的社会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或中心的,而现存的非市场领域也须列为重要的分析对象,进而应吸收生态学、新经济学之类的成果;须研究经济体系同自然环境、法律、文化、社会规范的相互影响;即使研究现代危机,也要从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四大危机,即贫困、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战争与纷争,环境与资源,以及管理社会与人们关系疏远等问题。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学派,而继承和独创融合的结果必然促进学派的不断产生和演变。目前,日本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有重视黑格尔逻辑学的见田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置盐派、新的新古典派马克思主义、伊藤诚领衔的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和八木的调节学派等。

其次,借鉴与批评相结合。与我国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属于日本学术前沿和重要主题之一,而借鉴数学工具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凸现为一个鲜明的特色。大西广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适宜增长理论的新解释——作为最适宜迂回生产系统的资本主义数学模型,武井博之关于资本主义的模式化和商品数量问题,濑尾崇关于个别资本的进化竞争模型等,均是如此。比如,在贸易和资本转移的克鲁格曼模型与列宁模型及其一般化的研究中,京都大学统计学教授大西广就国际间不均衡经济发展问题,对克鲁格曼的扩散理论与列宁的收敛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利润率从“克鲁格曼状况”向“列宁状况”的历史转换。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批评,仍然是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责任和思想进化的表现。石原洋介在探究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 and 短期化问题时指出,其实并非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是有效资本的分配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保证,而是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部分果实;况且,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是保证投资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富裕阶层的利益为优先;为了纠正这样的不正确性质,至少要以马来西亚的资本限制规定为成功案例,对短期资本的流动作出必要的限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驳斥,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消除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影响。

再次,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在立命馆大学松井晓等教授看来,规范理论是实证理论的相反概念,论述该有的体制、制度和伦理的理想;不过,自由主义主导的规范研究是有缺陷的,因为去掉平等原理是不能构成关于社会的规范原理的。他们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虽有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述,但关于资本主

义体制中榨取和阶级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却未提及,因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不关心规范理论。面对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倾向,日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以规范分析的观点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化,并努力以自由(含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平等(含所得和资产的平等)、共同(含合作)这些根本价值的视点为基础评价现代世界社会、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以及环境问题,进而形成“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在日本,诸如山本二三丸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和对人类经济社会终极关怀之类的规范分析较出色,然而从总体上观察,实证性的研究更多。例如,探讨能源的商品化和电力资源市场化对社会的影响,以日本群馬、栃木县制造业空洞化为例的区域经济发展波动,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问题,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全球化,以中国为例的市场经济和劳动力配置的性别歧视问题,等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除了高度重视对本国经济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以外,还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性质的经济体制改革。伊藤诚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大西广的《资本主义前后的社会主义》等,便是其代表作。

最后,原论与应用相结合。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的导引下,广泛研究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学科,深入探究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多样化具体实践,这又是一个鲜活的学术局面,比欧美国家大为出色。举例来说,把马克思经济学渗透到产业经济学,探讨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渗透到劳动经济学,探讨南北经济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劳资谈判和雇佣以及日本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等问题;渗透到金融学,探讨日本、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和控制等问题;渗透到财政学,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及如何激活处于长期低迷的国民经济等问题;渗透到企业组织学,探讨日欧美国家类型不一的企业形态和不断涌现的新业态等问题;渗透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探讨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及制度和政策怎样去促进等问题;渗透到世界经济学,探讨全球化中的非均衡发展、贫富分化、新旧国际经济秩序及资本主义的“原理像”与“变容(变样)”的差异等问题;等等。这类应用性的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的论著日渐增多。在此基础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参与政府和财团的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多种途径,来推行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不仅从根本和长期上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标本兼治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近期发展。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效的产业政策,贫富差别小于美国,较少的军费开支,较大的科教投入,以及独特的劳资关系和企业管理模式,均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宣传或必要的论战密切相关。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为对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感到自豪。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灵活地统一起来,颇值得我们借鉴。